

引 言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

书院制度之所以萌芽、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唐、宋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如果说，从唐代末期到五代时期，由社会动荡而引起的官学的衰微乃至废弃殆尽，以及宋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而无暇顾及官学教育，均使士子求学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是促使书院产生并一度兴起的主要历史机缘的话，那么，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士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书院的发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宋朝时，中国传统的儒学在以自身为主并吸取佛学与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理学的阶段。但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

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臻于成熟。

历史事实表明，具有独特教育制度的书院，是从唐代私人读书治学或讲学、授徒的书院发展而来，后来所建立的著名书院一般又以藏书为主要功能之一。这显然意味着书院的产生与发展，必须以书籍的大量流通作为前提条件，而雕版印刷术在唐代的产生，无疑正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由以上所述来看，书院制度只能是中华文明史发展到唐、宋时期的产物。不过，这还只是书院与中华文明史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具体表现：一是宋、元、明、清时，学术思潮的演变是与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没有书院的发展，无论是宋代理学的大盛还是明代心学与清代汉学的大盛，都是不可思议的；二是在上述朝代中有不少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如宋代的程朱学派、湖湘学派、金华学派、象山学派，明代的甘泉学派、阳明学派、东林学派，清代的乾嘉学派等，都是以书院为主要基地而形成或发展起来的。

其次，书院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宋、元、明、清时，除了有不少著名思想家与学者曾在书院充任主持人或从事讲学活动以外，还有一些著

名文学家活跃于书院的讲坛。书院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例如，清代号称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在书院讲学长达数十年，其弟子方东树、姚椿、姚莹、梅曾亮，再传弟子吕璜、方宗诚等，也曾在书院讲学。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清代一个最大的文学流派，应当说，姚鼐等人在书院所从事的讲学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三，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历代著名书院一般都有藏书，这就使一大批典籍通过书院得以保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愈来愈加严密的图书收藏与维护等方面的制度，从而丰富了我国的图书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宋代以后，书院还具有了刻书的功能，而书院刻书也为繁荣我国的图书事业做出了贡献。

其四，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笃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方

面，毛泽东早在 1921 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曾提出过“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的著名主张，这为我们正确借鉴书院的宝贵经验，指出了方向。

其五，还应提到三点：一是书院在促进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以及近代的社会演化等方面，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二是书院曾培育出大批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与近、现代历史上分别在各个领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这尤其能体现出书院对促进中华文明史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三是中国的书院文化还曾传播到国外，对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书院与中华文明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书院的起源

1. 唐代官方所设的书院

书院这一名称肇始于唐代。

唐代书院有官方所设的，也有私人所建的。唐代中央政府所设的书院相继称为乾元书院、丽正书院与集贤书院。说到这种书院，就不能不提到唐玄宗（685~762年）在位时整理内库（即皇官府库）图书的活动。

原来，我国的图书事业发展到隋代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唐王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隋朝政府的藏书，另一方面又一再从民间收购、搜集图书，并命人整理、校勘、写录、收藏。但到了开元初年，由于在此以前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封建统治者对图书事业重视不够，内库图书残缺遗逸、篇卷错乱的状况十分严重。为此，唐玄宗亲自发起了一场整理图书的活动。

综合《旧唐书》、《新唐书》、《集贤注记》、《唐会要》的有关记载，这一活动的主要经过大致如下：

开元三年（715年）冬，玄宗首次指示侍读马

怀素与褚无量整理图书。开元五年（717年），玄宗在东都洛阳正式下令部署，在东都乾元殿东廊下，分经、史、子、集四部校写内库图书，并广采天下异本，传写、收藏，称为乾元书院或乾元院。院内设刊正官4人，以其中之一褚无量为判院事，负总责，又设押院中使1人、知书官8人。

开元六年十二月，乾元院改称丽正修书院，又名丽正书院或丽正院（次年，徙书于东都东宫丽正殿），设置修书使与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此后几年间，先后由褚无量、元行冲、张说继续领导搜书、校书，并从事编目、编纂书籍等工作。同时，院内还相继增设了文学直与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以及丽正院修书学士，又先后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光顺门外与东都明福门外，也设置了丽正书院。

开元十三年（725年），张说等修撰《封禅仪注》一书告成。为庆贺这件事，同年四月，玄宗亲自在集仙殿宴请有功之臣。在这次宴会上，玄宗下令将丽正修书院改称集贤殿书院，又名集贤书院或集贤院（后又在西京兴庆宫和丰门南与临潼华清池北横街西也设立了集贤书院）。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五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宰相1人为学士知院事，常侍1人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1人、押院中使1人。后又设修撰官、校理官、留院官、文学直、书直、画直等，政府定量供给纸、墨与制笔所需的兔皮，继续从事图书的搜集、校写与编纂等。

到开元十九年（731年）冬，集贤书院经过自乾元书院以来对图书的不断整理、补充，已建立了一套规模甚为可观，并较为系统的藏书。院中藏书共计80080卷，其中经库13752卷，史库26820卷，子库21548卷，集库17960卷。

从上述可以看出，集贤书院及其前身乾元书院与丽正书院，是在开元年间由唐玄宗亲自发起的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中，依次出现的一种以图书的搜集、校理与收藏为主要职责的机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历史记载与《全唐诗》中的有关诗作还表明，集贤书院中所设学士的职责，除了主要从事图书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承旨撰文，侍讲侍读以及征求贤才、建言筹策等。不过，这并不能改变集贤书院作为从事校书、藏书事业的机构的基本特性。所以，集贤书院同乾元书院、丽正书院一样，与作为学校性质的书院是名同而实异的。

2. 唐代私人所建的书院

关于唐代私人所建的书院，从《全唐诗》中可以查到以下一些有关的诗作：卢纶的《同耿拾遗春中题第四郎新修书院》（一作《同钱员外春中题薛载少府新书院》）与《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王建的《杜中丞书院新移小竹》、杨巨源的《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吕温的《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杨发的《南溪书院》、李群玉的《书院二小松》、贾岛的《田将军书院》、

曹唐的《题子侄书院双松》、齐己的《宿沈彬进士书院》。这些诗作大抵都是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亦即唐代后期的作品。其中有的诗作对书院的活动有所述及，从中可知，这类书院大都是文人学者个人读书或研讨学问的所在地。

这些书院，仅从《全唐诗》的有关诗题还看不出其具体地点。不过，有 3 所书院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一所是费君书院。嘉庆《山西通志》卷五十九记载，在虞乡县（今山西永济）的五老峰下一所是李秀才书院。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九载明，在衡阳的石鼓山另一所是南溪书院。据雍正《四川通志》卷五载，该书院在南溪县西北

据地方志与其他书籍记载，在今属湖南、福建、江西、四川、浙江、陕西、广东、山东诸省境内，唐代还有一些私人所建的书院。它们是：衡山的韦宙书院、卢藩书院与邝侯书院，耒阳的杜陵书院，攸县的光石山书院，武陵桃川宫东北（今属湖南桃源）的天宁书院，漳浦的梁山书院，建阳的鳌峰书院，长溪东北（今福建福鼎）的草堂书院，江州（今江西九江）的景星书院，吉州东北（今江西永丰）的皇寮书院，高安的桂岩书院，遂宁书台山下的张九宗书院，巴州（今四川巴中）书案山的丹梯书院，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丽正书院，龙丘（今浙江衢州东北）的九峰书院，寿昌青山的青山书院，蓝田的瀛洲书院，浚昌（今广东南雄）的孔林书院，临朐的李公书院等。

这些私人所建的书院，大多数也建于安史之乱以后，并且多数也是个人隐居读书的所在，不过有的已经有了讲学、授徒的活动。如：皇寮书院的创建人刘庆霖曾在所创书院中讲学，桂岩书院的创建人幸南容曾在该书院“授业”，鳌峰书院则系其创建人熊祕的子孙的“肄业之所”（民国《建阳县志》卷八）。这后一种书院的出现表明，具备学校性质的书院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同时也应看到，类似于皇寮、桂岩、鳌峰这样的书院，在唐代还只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从书院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具备学校性质的书院，这时还仅仅是破土抽芽。

二、五代的书院

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852～912年）废唐称帝，改元开平，建立了后梁（907～923年），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其时，在北方，是后梁、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5个王朝的频繁更迭；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是除去北汉以外的吴、吴越、前蜀、楚、闽、南汉、南平、后蜀、南唐9国割据称雄的局面。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这一方面使书院难以有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官学废弃殆尽，以致继唐末战乱之后，士子求学愈发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从而使书院幼芽有可能继续滋长。事实上，在个别有适宜条件的地区，书院还是有所发展的。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书院，首推南唐境内德安东林山下的东佳书堂。该书堂始建于唐末。从《江州陈氏义门宗谱》所载陈崇立于唐大顺元年（890年）的《家法三十三条》来看，该书堂当时不仅吸收陈氏本族子弟入学，而且也接纳外地士子前来修业，书堂中还设专人负责管理书籍。因此，该书堂在唐末已具有教育功能。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值

得注意的是，南唐时，该书堂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北宋开宝二年（969年），著名学者徐锴应东佳书堂的门生章谷所请，为该书堂写过一篇《陈氏书记》。从中可知，在南唐烈祖李昇（888～943年）至后主李煜（937～978年）统治期间，该书堂已拥有数十间学舍，上千卷书籍和多达2000亩的学田，以供四方人士前来游学和本族子弟就学之需，并造就出一些知名之士。另据有关资料来看，这时该书院还有了“义门书院”的名称。所以，至迟在这时，东佳书堂无疑已是一所具有一定影响的家庭化书院了。

除东佳书堂外，这一时期，南唐境内还有匡山书院、梧桐书院等。

匡山书院在太和（今江西泰和），罗韜建。罗韜，字洞晦，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后唐明宗长兴（930～933年）间，曾被授端明殿学士，辞不就职归里后，因喜爱匡山山水而迁居太和，建书院于匡山山麓，从学者甚众。

梧桐书院在奉新梧桐山下，系当地人罗靖、罗简兄弟讲学之所。罗靖，字仁节，罗简，字仁俭，并称二罗先生南唐时，他们累辞官府的征召，一直在书院从事教学活动，以布衣终老。他们的门人分别称他们为中庸先生、诚明先生。

还应提到，在南唐境内，有一所庐山国学。它是宋朝以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因而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有必要予以说明。

庐山国学又名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学馆、白鹿国庠、白鹿国学、庐山书堂等，位于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白鹿洞的得名，与李渤（773~831年）有关。李渤，字浚之，洛阳人唐贞元（785~805年）间，他与兄长李涉（字清之）曾在这里隐居读书。由于他们养一白鹿自随，故人们称他们为白鹿先生。其隐居地因“四山迴合，似洞”（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三），则被称为白鹿洞后来，李渤做了江州刺史，在白鹿洞营建台榭，种植花木，并引来流水，使之成为一处景观。于是，白鹿洞随之而逐渐闻名。庐山国学始建于南唐升元（937~942年）间。其时，南唐当局在建学的同时，还设置学田以供生徒所需，并任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负责教学

南唐时，除李善道外，在庐山国学任教的还有陈贶、朱弼等人

陈贶，南闽人平生热衷于教育，不爱做官。南唐元宗李璟（916~961年）曾亲自召见过他，授以江州土曹掾的官职。他固辞不受，依旧回到庐山从事教学他在庐山国学任教长达30年，许多生徒都出自他的门下。

朱弼，字君佐，建州（今福建建瓯）人。他在庐山国学任教时，很善于教学据载，每当他“升堂讲释”时，“生徒环立，各执疑问难，问辩锋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三）。可

知，他对生徒们在课堂上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能迅速做出合理的解答。虽然那些问题都是由生徒们临时提出来的，他却能通过自己的解答，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仿佛那些问题都是他事先想好了似的。因此，他深受生徒们的爱戴。由于仰慕他的名声，前来庐山国学肄业的生徒，也比以往多出好几倍。南唐灭亡以后，他曾任衡山主簿，后为南岳庙令。

南唐时的庐山国学曾造就出不少人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中、伍乔、江为、刘洞、杨徽之（921~1000）、卢绛、蒯鳌、段鹄、孟归唐、李寅、何昼、刘式等。

李中，字有中，九江人。早年肄业于庐山国学。后任新淦令等。著有《碧云集》。

伍乔，庐江人。曾在庐山国学肄业数年。后举进士。任歙州通判、考功员外郎。能诗，精于《易》。南唐灭亡后，隐居不仕。

江为，建阳人。曾在庐山国学从陈贶受业。有诗集行世。

刘洞，庐陵人。曾在庐山国学从陈贶学诗。其诗长于五言，自号“五言金城”。李煜即位后，他曾献诗百篇。去世后，有遗集行世。

杨徽之，字仲猷，浦城人。年少时，即好学问庐山国学之名，前往，肄业。后周显德（954~960年）中，举进士。北宋乾德（963~967年）中，任天兴令。后历任峨眉令、侍御史、礼部侍

郎、翰林院侍读学士

卢绛，原名究，字晋卿，南昌人。曾在庐山国学从朱弼受业。南唐后主时，官沿江巡检、昭武军节度留后后降宋，被授冀州团练使

蒯鳌，宣城人。家贫好学，入庐山国学，从朱弼受业。北宋太平兴国（976～983年）间，举进士。历官至殿中丞。

段鹤，字正己，永新人。曾在庐山国学读书10余年。后于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举进士。任大理寺丞。

孟归唐，建阳人。与段鹤同入庐山国学读书。能诗北宋开宝（968～975年）中，被授秘书省正字。历官至大理寺丞，后贬为袁州司户

李寅，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与段鹤、孟归唐同人庐山国学读书。北宋雍熙二年（985年）举进士。任衢州司理参军。

何昼，永新人年少时读书于庐山国学。北宋开宝五年（972年）举进士。官至凤翔观察推官。

刘式，字叔度，清江人。曾读书于庐山国学。后举进士北宋初，任鸿胪、大理寺丞，刑部郎中等。他的五世孙刘清之（1134～1190年）藏有他手抄的《孟子》、《管子》，据说就是他在庐山国学读书时的“日课”。

在分裂混乱的五代时期，南唐的书院却能有所发展，其庐山国学尤能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较为明显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当时南方诸国比

中原地区战乱较少，人民的生活环境较为稳定，因而社会经济仍能呈向上发展的趋势，而南唐在南方诸国中，又“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陆游《南唐书》卷二），堪称“大邦”，这种情况自然有利于文化教育的发展。其次，南唐的 3 位君主李昇、李璟和李煜都喜好儒学，李璟、李煜又都酷爱文学，是著名的词人，他们都很重视文化教育，李璟还曾亲临庐山国学视察过。南唐君主的这种重视与关切，显然也是南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代时期，除南唐以外，在其他地区也曾建有新的书院，如洛阳的龙门书院、登封的太乙书院以及窦禹钧在其家乡渔阳（今天津蓟县）所建的书院等。其中，窦禹钧所建的书院有房舍数十间、书籍数千卷，礼聘德才兼备的儒士担任教师，并为那些前来求学的出身寒微的贫苦士子提供所需的学习条件。

从以上可以看出，五代时期，有的书院已有了较多的藏书，并能为家境贫寒的学习者提供资助；有的书院还有了专供解决办学经费问题的学田。此外，在作为白鹿洞书院前身的庐山国学中，还出现了“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和“日课”。所有这些，都势必对以后的书院发展产生影响。不过也要看到，这一时期，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为数依旧极少。在书院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这一时期无疑仍未超出萌芽的阶段。

三 北宋的书院

宋初的著名书院及其特点

宋初的著名书院。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初，在后周任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927~976年）发动兵变，即帝位，改元建隆，建立了宋王朝，都于开封。史称北宋。

宋初，唐末以来动荡、分裂、混乱的局面渐趋结束，从而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士子们有着强烈的求学愿望，但由于宋朝封建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军事、政治和财政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官学的发展尚无暇兼顾。在这种形势下，书院适应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运而兴。

关于宋初的著名书院，至迟从南宋以来，一直有所谓“四大书院”的说法。但“四大书院”的具体所指，却众说纷纭。主要说法：一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4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宋人吕祖谦（1137~1181年）的《白鹿洞书院记》、王应麟（1223~1296年）的《玉海》、元人吴澄（1249~1333年）的《重建岳麓书院记》、明人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清人汤斌（1627~1687年）的《嵩阳书院记》等。二是徂徕、金山、

石鼓、岳麓 4 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宋人范成大（1126～1193 年）的《衡山记》。三是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 4 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宋人袁燮（1144～1224 年）的《四明教授厅续壁记》四是白鹿洞、石鼓、应天府（睢阳）岳麓 4 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元人马端临（1254～1323 年）的《文献通考》、明人王禕（1322～1373 年）的《游鹿洞记》等。五是睢阳、石鼓、岳麓、白鹿洞 4 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明人李梦阳（1473～1530 年）的《大梁书院碑记》。

以上几种关于宋初“四大书院”的主要说法所涉及的书院，除了徂徕书院以外，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石鼓、茅山 6 所书院，都是较多为后人所提到的（范成大所说的金山书院，实即茅山书院），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们都看作是宋初声名尤著的 6 所书院。

岳麓书院。在善化县（今湖南长沙）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宋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其时共建讲堂 5 间、斋舍 52 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潭州太守李允则予以扩建，使讲堂位于书院中心，并建书楼，设像供祀孔子及其弟子，又辟水田，以解决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释奠”（古代学校祭祀先师的典礼之一）的经费问题。生徒定额 60 余人。李还上奏朝廷，请求颁发书籍，以备生徒肄业所需。旋由国子监发给该书院